

北京大学电影研究丛书

李道新
电影文章自选集

光影绵长

李道新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李道新
电影文章自选集

光影绵长

李道新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光影绵长: 李道新电影文章自选集 / 李道新著.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7.7

(北京大学人电影研究丛书)

ISBN 978-7-301-28462-9

I. ①光… II. ①李… III. ①电影评论—文集 IV. ①J905-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7) 第126209号

书 名	光影绵长: 李道新电影文章自选集 GUANGYING MIANCHANG
著作责任者	李道新 著
责任编辑	李冶威 周 彬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28462-9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新浪微博: @北京大学出版社
电子信箱	pkuwsz@126.com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0883
印 刷 者	三河市国新印装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660 毫米 × 960 毫米 16 开本 29.25 印张 450 千字 2017 年 7 月第 1 版 201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69.00 元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62752024 电子信箱: fd@pup.pku.edu.cn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部联系, 电话: 010-62756370

北京大学中坤影视戏剧研究基金 支持

北京大学中坤影视戏剧研究文丛

北 大 学 人 电 影 研 究 丛 书

顾 问：王一川 王丹彦 叶 朗 仲呈祥 陈凯歌 黄会林

韩三平 张宏森 张会军 彭吉象

总 策 划：高秀芹 陈旭光

名誉主编：骆 英

主 编：陈旭光

编 委 会：王一川 向 勇 陆 地 陆绍阳 陈 宇 陈 均

陈旭光 邱章红 李道新 张颐武 周庆山 周映辰

高秀芹 顾春芳 彭吉象 蒋朗朗 韩毓海 戴锦华

“北京大学电影研究丛书”编者前言（代丛书总序）

鲁迅先生说过，“北大是常为新的”。北京大学不仅在许多“基础性”学科研究上稳重踏实、独占鳌头，也在一些新兴学科上与时俱进，锐意创新，敢为人先。

在人文学科领域，电影研究的历史与传统算不上悠久。诞生于1895年12月28日的电影，一般认为1948年法国成立电影学研究所，并出版《电影学国际评论》，才是电影学作为一种新学科诞生的标志。

而且，北京大学的电影教育，严格地说开始于北京大学艺术学院1999年招收电影学硕士和2001年开始招收影视编导本科，比之于北大其他“老牌”“经典”的人文社会科学可能尚属“晚辈”。然而，北京大学学者们电影研究和电影批评的历程可谓不短，而且成就不小，影响颇大。不少学者在20世纪80年代人文领域文化批评的潮流中就登上了当时的批评舞台，引领一时之风骚。

北京大学的电影研究与批评，有一些重要特点。如学者们散布于北京大学艺术学院、中文系、新闻传播学院、外国语学院等多个院系；再如学者们大多有多学科的背景，电影研究往往只是这些学者学术工作的一个有机部分；还有，这些学者都是北京大学影视戏剧研究中心的研究员，他们都在电影的文化研究、艺术研究、电影史、电影批评史、电影传播、电影产业研究等方面有着重要的发言权和学术影响力。他们以“常为新”的锐

气，学科整合的视野，传承自北大的开阔胸怀，以勤奋严谨求实创新的学术精神，共同打造着北京大学电影研究的高端平台。

毫无疑问，电影研究与批评的学科特点与北京大学的综合性优势颇为切合。正因此，北京大学涌现出那么多有影响力的电影学者乃为题中应有之义。因为电影学是从社会文化现象、审美现象及大众传播手段等角度研究电影的科学，而电影理论一开始就有相当明显的跨学科趋向，从经典电影理论开始，电影理论就与哲学、美学、文学、戏剧、艺术学、心理学等关系密切，这也与电影本身的综合性特征，电影文化的复杂性特征等相适应。二战结束后特别是50、60年代以来，电影学与其他学科进一步整合，研究领域明显扩大。

正是借助于北京大学影视戏剧研究中心这个有效整合北大影视戏剧研究学术力量的平台，我们主持编辑了这套“北京大学人电影研究丛书”，试图对北京大学雄厚深蕴、颇有影响力的电影研究学术力量和研究成果进行一次集中的盘点和集群式地呈现。

鉴于此，这套丛书目的堪称明确，立意不可谓不高远。各位知名学者的自选论文、自序或访谈呈现的方法论思考和学术总结、著作论文索引等工作，都通过作者、主编者与编辑等的通力合作，做足做细。在北大培文的积极配合之下，我们力图把这次庄重大气的巡礼、展示和总结尽可能做到最好、最高、最全面。

北京大学影视戏剧研究中心自成立以来，秉承“研究指导实践，研究紧靠实践，研究提高教学，引领影视戏剧艺术与产业发展”的宗旨，致力于推动电影、电视剧、戏剧、新媒体领域的学术研究，打造北大影视戏剧与新媒体研究与研发的核心品牌，为中国影视戏剧与新媒体的产业振兴服务，引领影视戏剧和新媒体文化价值和艺术内涵的发展方向。编辑出版这套“北京大学人电影研究丛书”就是这些近年来中心重点的学术工作之一。

也许，这不仅仅是一次实力的巡礼和成果的检索，更是一次电影研究之北大视野、北大胸怀、北大气象的呈现，甚至可能是一种“北大学派”之发力和形成的前奏。

我们坚信：学术薪火相传，北大精神绵绵不绝。

北京大学影视戏剧研究中心

“北京大学人电影研究丛书”编委会

目 录

从“专题”到“整体”：中国电影的历史景观（代序）……001

上 电影史：理论方法

中国电影：历史撰述的开端……033

民国报纸与中国早期电影的历史叙述……050

民国电影：概念认定与历史建构……075

冷战史研究与中国电影的历史叙述……092

台港电影的中国化阐释……111

——从文化身份的角度观照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内地的台港电影研究

史学范式的转换与中国电影史研究……130

电影的华语规划与母语电影的尴尬……139

重建主体性与重写电影史……157

——以鲁晓鹏的跨国电影研究与华语电影论述为中心的反思和批评

跨国构型、国族想象与跨国民族电影史……172

中国电影史研究的主体性、整体观与具体化……197

下 电影史：研究实践

作为类型的中国早期喜剧片221

作为类型的中国早期歌唱片245

——以 30—40 年代周璇主演的影片为例兼与同期好莱坞歌舞片相比较

中国的好莱坞梦想262

——中国早期电影接受史里的 Hollywood

人生的欢乐面，他国的爱与恨276

——中国早期电影接受史里的哈罗德·劳埃德

帝国的乡村凝视与殖民的都会显影299

——以 1937 年“满映”制作的“文化映画”《光辉的乐土》和
《黎明的华北》为例

沦陷时期的上海电影与中国电影的历史叙述320

电影启蒙与启蒙电影336

——郑正秋电影的精神走向及其文化含义

以光影追寻光明364

——沈浮早期电影的精神走向及其文化含义

惨胜的体制与渐败的人381

——试论“吕何联盟”及其“春天喜剧社”的前因后果

香港电影：跨越边界的新景观406

新民族电影：内向的族群记忆与开放的文化自觉411

构建两岸电影共同体：基于产业集聚与文化认同的交互视野421

李道新著述目录441

从“专题”到“整体”：中国电影的历史景观（代序）

受访：李道新 访问：石贤奎

从追影的农村少年到追梦的北大教授，从孤独的身心求索到激情的丰富言说，从“专题影史”的深入开掘到“五史共建”的两岸电影；对我而言，李道新教授的学术人生，颇为曲折却又令人魅惑。

——石贤奎（北京大学艺术学院 2016 级博士研究生）

一、机缘

石贤奎：读您写的书，最爱看的就是“后记”。在《中国电影批评史（1897—2000）》里，您写下了这么一段：“少年时代看电影，总是在乡村禾场上。银幕上的光影之舞和夜空中的星月之魅交相辉映，形成一生中最美好的怀想。”在《影视批评学》里，您又写道：“现在总爱想起十五六岁在家乡小镇上寻觅的日子：那是一个又矮、又黑、又瘦的农村少年，单薄的身体淌过寒风，停留在一个小小的书摊旁，以一分钱为代价租得一本缺少封面的《大众电影》，让贫瘠的心灵短暂地沐浴在梦幻的阳光之中。”少年时代的阅读体会和观影经验，是您走到今天的原动力吗？

李道新：应该是吧！我想我可以回顾一下我个人的阅读史和观影史，权当打开一个记忆的“抽屉”，补充一点作家龙应台所提的“国民记忆库”，以个人史观照国家历史。

我最早的人生理想是当作家。记得是在1980年冬天，我还在乡里读初中三年级的时候，写了一篇作文《我的理想》。就是在湖北省石首县^[1]新厂公社驼杨树中学一个冻得特别难熬的教室里，14岁的我第一次开始正视自己的内心，向往自己的未来。我发现我是爱好文学的，今后必将坐在“窗明几净”的房子里写作并以此为生。现在看来，我的理想是实现了，特别是在写完了每本书的“后记”之后。

少年时代喜欢读书，痴迷电影，想来可能遗传了父亲的基因。祖父祖母去世很早，我是从来没有见过他们，也不知他们的名字和来历。我们家的家谱很短，仅能上溯到父亲一辈。我只知道，父亲那代人已经在江汉平原南部的湖北省石首县新厂公社银海大队一队务农了。家乡紧邻长江，县城在江南，老家在江北。江汉平原平畴沃野，沟渠纵横，作物繁茂，确是鱼米之乡，但每年夏天都有决堤溃垸、四散奔逃的恐惧。父亲个头不高，身形羸弱，只上了很少的学，但属于天资聪颖的一类人，字写得好，表达能力强；出门在外，性格温和，知书达理，还担任过合作社的秘书。记得家里曾有一些文件字纸，是中共中央革委会、湖北省革委会下达的各种红头文件，里面的主席语录和大红公章，是我最早看到的外面的世界，在遥不可及的地方主宰着人的命运。除此之外，就是父亲开会后留下的笔记了，总是誊写工整、字迹清秀。遗憾的是多年漂泊、老屋早颓，没有把父亲的东西保存下来。在我生命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内心渴望却又始终拒绝回到父亲那里去。

在我的记忆中，从来没有存留过父亲的形象。他在我不到5岁的时候就去世了。现在我必须凝神屏气，才能穿越时空，回到1969年或1970年

[1] 1986年5月27日，国务院批准撤销石首县，设立石首市。——编者注

的那个冬夜。三四岁的我坐在一个男人的双腿上，在家里烤火取暖的火堆边，水罐冒着热气，煤油灯芯跳跃，大门被寒风吹得吱吱作响，屋外被大雪压弯的楠竹猛扫着房顶的茅草。这就是我脑海中全部的父亲印象。父亲的缺席与父爱的早失，对我造成的影响极其深远。

母亲是目不识丁的孱弱农妇，总在为短缺的柴米油盐操心，也要为失去依靠的内心痛苦。有了委屈，便会摸到父亲的坟头前哀哀地哭。家里四个姐姐一个妹妹，严重缺乏壮实的劳动力，这都让我很早就没有了基本的安全感，知道任何事情都得靠自己解决。早晨上学，如果饭还未好，便会背了书包直奔学校；中午回家，如果母亲和姐姐们仍在农田里忙碌，便会从菜园里揪下两根黄瓜权当果腹；小学、中学都遭遇过对我来说比较严重的校园欺凌，但永远只能表现得忍气吞声，小心翼翼。高中住校时，三个人一张床，连翻身都困难；早晨出操更是心理负担，因为鞋子已经裂开无法跑步，屁股后面的裤子还破了一个洞。像我这种1966年出生的农民之子，虽然赶上了改革开放的早班车，但还留存着刻骨铭心的饥饿记忆，以及因贫困带来的过度自尊。我们仍然属于在广大国土上野草一样自生自灭、不可预期的一代人。

那时候，农村生活简单，书籍匮乏；学校条件不好，读书纯属义务。既没有像李白一样遇到铁杵磨针的老媪，也没有想象过鲁迅的百草园和三味书屋。记得上小学，开学第一天去得晚了，就没分配到桌椅，只是站在黑板前，看着老师写的几个粉笔字，跟着咿咿呀呀地念。这就成为正式接受教育的小学生了。没想到，学校后来竟弄得连我们坐的凳子都要自己从家里扛。去到学校路上必经的一座小木桥，因为年久失修，每次走过都是战战兢兢，冬天结冰了更是可怕，以至于晚上睡觉都被吓醒过好几次。还有几个学期，根本没有发课本，就是跟着老师抄黑板，主要内容都是延安的窑洞、总理窗前的灯光和朱德的扁担什么的。现在想来，那真是一个物质与精神双重匮乏的年代，也是一个国家和民族亏欠并愧对子民的年代。这样的历史最好不要怀念。

好在学期伊始，每次发下的语文、社会、历史、自然一类的教科书，一两天便会被我囫囵吞枣地读完；就想着能赶紧再来一个新的学期，再发一套新书。对文字及其所指世界的强烈向往，让我走到哪里都想看书，也让我的性格显得内向而又文弱。千方百计找到过一些已被撕得体无完肤的小说残本，也是如饥似渴地读来读去。《西游记》当然是最好看的，可惜总是读不到书头书尾；《红楼梦》只看大观园里的各色人等和各种悲喜，诗词曲赋则会直接跳过；《林海雪原》照例喜欢杨子荣少剑波，但也无法理会白茹的心。

除此之外，克杨、戈基在“文革”期间出版的小说《连心锁》，竟然看过好几遍；杨佩瑾的抗美援朝小说《剑》，塑造的梁寒光、周良才和王振华等英雄，是真正感动过我的。多年后找到这本小说，翻到当年记忆最深的情节，感慨也是很深。当志愿军战士王振华跟李承晚伪军格斗时，一起跌落在陡峭的断壁之下，苏醒过来之后，作者写道：“月亮钻进云层里去了，天上一片昏暗。月光从一团团云堆的边缘上，从许多云层稀薄的地方透射出来。王振华忽然觉得，整个云层就象一床破破烂烂的、百孔千疮的烂棉絮，没头没脑地覆盖在他头顶上。这个景象，使他一下子想起了小时候，家里那床唯一的、象猪油渣那样的烂棉絮。这床烂棉絮的年龄，恐怕比他父亲还要大一点。小时候，王振华常常和妹妹钻进烂絮底下，两人比赛：看谁能从烂棉絮的洞孔里，透过破屋顶，望到天上的‘月亮姑姑’。……”这是在朝鲜，在异国他乡，一个负伤的孤独的中国战士，对家乡的父亲和妹妹的思念。40年前读过，现在还能记得当时的感受，不能不说也是一种奇迹。毕竟，《剑》并不是一部公认的名作，甚至大量中国当代文学史著作也从未提及。当然，印象很深的，还有浩然的散文诗体小说《西沙儿女》，那种海岛椰林战争浪漫的意境，也会让从未远足的少年莫名其妙地神往。

因为对文字的痴迷，即便贴在别家房屋墙上当作装饰的报纸，也都会一张一张地滤过，一行一行地浏览，然后就闷头想着报纸上面的事情，反击右倾翻案风、西哈努克亲王、深挖洞广积粮备战备荒为人民什么的，亲

友招呼也反应不过来，弄得周围的人以为这个孩子不太正常。

看书之外，还特别喜欢看戏看电影，主要是农村演出和电影放映都太难得。春节期间，如果有演戏，就会在大队部的礼堂，有一些乡村剧团甚至草台班子过来包场，锣鼓铙钹，很是热闹。小孩子都会很激动，当然要往嘈杂的地方跑。只记得湖南花鼓戏《刘海砍樵》，真是好听得不得了，但还是很少有机会听到。有一回，大队礼堂唱戏，我却在礼堂外叫卖自家的甘蔗。

每月一次的露天电影，是少年时代最大的期盼。放映刚一结束，就在等着下一个月了；还在不断地祈祷老天爷，千万不要在放映队到来的那一天下雨；如果真的下雨了，人就会像霜打的茄子一样蔫了下去，干什么事情都没有了兴趣。大约一算，国产影片中的《南征北战》《钢铁战士》《鸡毛信》《平原游击队》《渡江侦察记》《冰山上的来客》《烈火中永生》《地道战》《地雷战》《侦察兵》《沙漠的春天》《车轮滚滚》《神笔马良》《大闹天宫》《三打白骨精》《刘三姐》《追鱼》《审妻》《穆桂英大战洪州》《奇袭白虎团》《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神秘的大佛》《少林寺》等，以及外国影片中的《列宁在1918》《攻克柏林》《卖花姑娘》《流浪者》《魂断蓝桥》《冷酷的心》《人世间》《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桥》《追捕》《幸福的黄手帕》等，都在银幕上看到过。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那是一个露天电影的黄金时代，几乎承载着所有的童年记忆和少年梦想，萌生了我们对自然、星空与远方、人群的最初的认知。从这样的角度看，我们的人生又应该感谢露天电影。十年前，写过一篇学术论文《露天电影的政治经济学》，就是为了纪念我的年少观影。实际上，我的很多学术论文，看起来客观理性不可亲近，但还是试图跟我的人生旅程和情感经历联系在一起的。

在上述学术论文里，我在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传播政治经济学以及电影观众心理学之外，曾经充满感情地写道，除了宣传教育、普及大众之外，露天电影的特殊功能和内在潜力，主要体现在独特的观影心理。跟影院电影不同，露天电影往往没有固定的场所和座位，观众的视域可以自由

调整；观众分布虽然以银幕为中心，却几乎没有边界，能够将银幕上的活动影像、银幕下的各色人等以及大自然的多变夜空尽收眼底；声音环境也是丰富而又驳杂的，除了自然界的风声、雷声或雨声外，发电机的轰鸣、放映机的运转以及观众的交谈和嬉闹，跟影片本身的声音系统交互作用，为露天电影带来一种难得的仪式感和狂欢气息；更为独特的是，由于露天电影几乎发生在每一个不可复制的特殊场所和天气环境，那么，观看露天电影的体验的丰富性，势必远远超出影院电影；另外，露天电影也为观众之间的情感交流提供了更加开放的平台。精力过剩的少年儿童、情窦初开的少男少女、絮絮叨叨的家庭主妇和久未谋面的乡党邻里等，都能在这种氛围里获取合适的对象进行交流，在观影过程中得到更多的身心抚慰。也就是说，自由的观看和率性的交流，不仅是露天电影内蕴的一种独特魅力，而且是将观影行为真正娱乐化、游戏化和民主化的必要途径。这是影院观看、家庭观看和网络观看无法具备的独特品格和精神气质。

显然，这些叙述都可以基于以下的一些个人观影史。有一次，初中学校附近放映《烈火中永生》。当天放学后，为了占到一个更好的观影位置，便直接到了放映场地，饿着肚子独自一个人苦等，直到太阳慢慢隐去，银色幕布缓缓挂起，放映机在发动机的带动下射出神秘的光线，观众的喧闹在影片开始的瞬间骤然停止。那一刻，就是人生期待的最大满足，没有任何事物能够替代。另一次，到隔壁村看完黄梅戏故事片《天仙配》，回家的时候也是独自一个人，顶着深冬的凄风苦雨，行走在乡间的墨黑夜色之中，还不慎跌落到一户人家的粪坑里，这是第一次体会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孤独感和恐惧感。现在想来，如果没有对故事和光影的殷切期待，我真不知道何时才能走出那种黑暗。

石贤奎：在我们这一代人看来，您似乎也是一个励志的奇迹了。

李道新：所以，我经常会以我自己为例，苦口婆心地教育学生们不要认命，也不要“拼爹”。但我发现似乎不起太大作用，很多更年轻一些的人

都认为时代不一样了。确实，我觉得除了各种机缘之外，更重要的是，我们这一代“60后”，也正是由我们这一路走过的时代造就的。在我出生和成长的年代里，特别是在20世纪80、90年代，我们在某种意义上实现了我们自己的梦想。从这个角度，我也一直感恩于伴我走来的那个年代。从农村少年到北大教授，从故土求知到海外讲学，梦想就是这样照进了现实。现在，每当我站在北京大学理科教学楼、第二教学楼数百人选修的通选课讲台的时候，总觉得有点不可思议；而在日本东京大学、韩国釜山大学、美国华盛顿大学和意大利罗马大学的校园里，更是感受到了一个好像并不那么真实的时空。

石贤奎：对您从乡村到都会，从文学到电影不断跨越的心路历程，我们还是很感兴趣。

李道新：这种命运转机及其心路历程，映照出的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个体选择和普遍命运。其中的几个主要节点，想来还是很有意味的。

首先是随机的生长与理想的确立。对于我来说，成长的过程除了物质的匮乏、食物的短缺和身心的孤独、精神的荒芜以外，倒也没有太多的约束和太重的期许及其带来的太过强大的压力。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那个年代的湖北乡村，对外交流很少，信息沟通有限，父母兄姊几代人以及周围的环境，都是相对封闭保守和自认天命的。记得家里安过广播；但偶尔只在傍晚听到过湖北人民广播电台转播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节目；第一次看到电视，还是在1981年中国女排获得世界杯冠军的那一天，在镇里中学很少开放的教工活动室里，电视和排球都是陌生的事物。读高中一年级时，亦即1982年前后，村里才通了电，家里安了一个15瓦的电灯泡，还高兴得手舞足蹈；此后几年，电压不稳，电灯时有时无，断电的时候就恢复了祖祖辈辈沿用下来的煤油灯。在煤油灯下读书写作业，是我学生时代永不磨灭的记忆，煤油的味道至今还在萦绕。也会偶尔听人说起外面的世界，还时不时流传村里某人在北京当了大官，但对我来说，这都是非常

遥远无法想象的事情；北京只在报纸图片和纪录电影里看到，是庄严肃穆的天安门城楼上闪着金光的那种感觉，也是手捧鲜花盛装迎送外国元首的那些幸福快乐的首都少年。18岁以前，我是没有到过比沙市、荆州更大的城市，也没有想过有朝一日会在北京学习、工作和生活。

也正因为如此，没有人会对一个普通得几乎没有任何存在感的学生存在更高的期冀。尽管恢复高考制度以后，社会上开始流行“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观念，但对我这种连大学本身都很有可能考不上的学生，是否学好数理化，还是被迫文史哲，其实都是没有意义的遐想（瞎想），更不用说考什么音乐、美术、电影方面的专业性学院了。只有达到了残酷的高考录取分数线，才有机会填报志愿选择专业；而这种机会，几乎是不敢想象的奢侈。好在高考结束，填报志愿选择专业的时候，也因此获得了奇迹般的自由，几乎没有任何人质疑我凭那样的分数，为什么要报黄石师范学院中文系，而不是湖北财经学院任何专业。有趣的是，尽管满足了自己的专业理想，但我还是感觉到了些许的失落。在一篇名为《老父亲》的散文里，我曾经写道：“考大学的时候，我知道我的人生已经开始面临重大选择。我还没有成熟到胸有成竹地自作主张的地步，我希望五十九岁的父亲首先给我一个参考或者命令，然后我再遵守或者叛逆，两者必居其一。做父亲的不可能对儿子的选择无动于衷。但我终于失望了。我报了师范学院，我的父亲竟然再一次不置可否。”考大学的时候，我的父亲已经去世十几年了。

人生的第二个重要节点，是在大学毕业后去中学教书，一年后又非常遗憾地离开家乡，一头扎入古都长安，在西北大学中文系攻读中国现当代文学方向硕士研究生。文学让我领略了尘世之中无法体验的人生意义，文学研究也把我导向一个可能更加适合自己的精神世界；而在硕士生导师赵俊贤教授的启发和指引下，开始寻找某种试图将感性写作与理性分析结合在一起的表达方式。更重要的是，在西安的五年，是我人生中最大的改变。就像一个轻飘的灵魂，突然遭遇厚重的历史和鼎盛的人文，到今天都